

地中海共同体: 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李永斌

【提要】 关于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尤其是古风时代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比较研究—地中海共同体—网络理论”的范式转变。其中,“地中海共同体”或许是可资借鉴的最佳理论范式。在不同的历史学家笔下,“地中海共同体”所呈现的一般特点有: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因联系而形成的“区域”统一性与独特性紧密联系,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高水平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其中,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是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地中海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将“地中海共同体”作为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一种范式,还需要注意考察不同的时空范围、不同的社会结构、各文明的独立性与差异性等问题。

【关键词】 地中海共同体 比较研究 网络理论 文明交流互鉴

近年来,海洋史研究和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热点就包括“海洋史研究的新拓展与新特征”;2019年5月,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两个学术热点的基础上,还存在不少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研究领域。在海洋史研究的新拓展中,地中海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但是对于古代地中海史,大多数人还了解不多,学术界也缺少相应的讨论。在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热潮中,学术界主要关注的还是丝绸之路东段的文明交流,对于前丝绸之路时期亚欧大陆西段的文明交流的关注不多,对地中海文明交流的研究则更少。本文尝试将地中海史研究与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作为古代文明交流研究新范式的“地中海共同体”的一些相关问题。

一、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范式转变

经历了晚期青铜时代文明的普遍崩溃^①以后,公元前10世纪—前8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几个主要文明区域又逐渐恢复了生机,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变得日益频繁。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的研究兴趣日增。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研究大致经历了“比较研究—地中海共同体—网络理论”的范式转变。

比较研究是第一种范式,也是传统的研究范式。由于希腊地区在古典时代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

* 本文是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丝绸之路开通前欧亚大陆文明交流互鉴研究”(项目编号:SZ202010028011)的阶段成果。

① 关于晚期青铜时代的崩溃,参见 Nancy H. Demand, “The Late Bronze Age Collapse and Its Aftermath”, *The Mediterranean Context of Early Greek History*, Wiley-Blackwell, 2011, pp. 193–219。

响都比较突出,所以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是以希腊为中心,尤其是希腊与近东地区的比较。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到希腊与近东地区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相似性。^①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线形文字“B”的破译,比较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②集大成者是瑞士苏黎世大学德国籍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克特,他于1984年在《海德堡科学院会刊》发表了德文著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③他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诸多具体文化事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比较研究,如迁移的工匠、东方传往西方的巫术和医学、阿卡德文学和早期希腊文学的关系等。1996年,伯克特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卡·弗斯卡里大学举办了四场关于早期东方与希腊相互影响的主题讲座,随后结集成书,该书迅速被翻译为法文、西班牙文、德文、英文和中文。他在书中对《荷马史诗》的东方化特征、东方智慧文学和创世神话、俄耳甫斯与埃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领域另一位成就卓著但也备受争议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1987年,马丁·伯纳尔出版《黑色雅典娜: 古典文明的东方之根》第一卷,随后20年间,又相继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④尽管伯纳尔的激进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但也激发了学界对早期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比较研究的热情。^⑤

第二种研究范式可概括为“地中海共同体”。早在194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就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⑥这部名著中在一定程度上将16世纪后半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这一做法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地中海共同体”的观念。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也逐渐为古代史学者接受和借鉴。明确提出“地中海共同体”(Mediterranean Koine)^⑦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学者斯波尔德和斯登伯格,他们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阿莫斯与赫西俄德: 比较研究的几个方面》中提出了这个概念。^⑧美国布朗大学的德国籍学者科特·拉夫劳伯于1998年在芬兰举行的“亚述的遗产”学术研讨会上再次提出这个概念。^⑨尽管他们没有深入论述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都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认为古风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交汇的共同体。当然,在正式提出“地中海共同体”概念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有了类似的研究和阐释。198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杨·莫里斯认为,希腊社会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来源于地中海共同体中早期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关于神灵、过去、空间组

- ① 参见瓦尔特·伯克特《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 巴比伦·孟菲斯·波斯波利斯》唐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 ② Michael C. Astour, *Hellenosemitica: An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y in West Semitic Impact on Mycenaean Greece*, Brill, 1967.
- ③ Walter Burkert,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H. 1, 1984.
- ④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Vol. II,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Vol.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2006.
- ⑤ 相关的主要作品有 M. L. West, *The East Face of Helik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rolina López-Ruiz, *When the Gods Were Born: Greek Cosmogonies and the Near Ea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等。
- ⑥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 ⑦ *Koine* 一词出自古希腊语,基本意思是“共同的”“一般的”,很多时候专指以阿提卡方言为基础的“共同希腊语”。在一些关于古代文明的论述中,*Koine* 一词也用于指称某种“共同体”。本文所论述的“地中海共同体”,借鉴了社会学领域“共同体”一词的基本含义,即“基于人的本质意志、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传统地域社会”。参见尹广文《共同体理论的语义谱系学研究》,《学术界》2019年第8期。
- ⑧ K. Seybold, J. von Ungern-Stenberg, “Amos und Hesiod. Aspekte eines vergleichs”, *Anfänge politischen Denkens in der Antike: Die nahöstlichen Kulturen und die Griechen*, Hrsgs. K. A. Raaflaub und E. Müller-Lückner, Roldenbourg, 1993, S. 215–239.
- ⑨ Kurt A. Raaflaub, “Influence, Adaptation, and Interaction: Near Eastern and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in S. Aro and R. M. Whiting, eds., *Heirs of Assyria: Proceedings of the Opening Symposium of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Intellectual Heritage Project Held in Twärminne, Finland, October 8–11, 1998*,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 2000, pp. 51–64.

织,都有了相应的新观念。^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古典考古学家萨拉·莫里斯在1992年出版的《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中提出,从青铜时代直至古风时代,东部地中海世界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内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常态,而希腊也是这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②不过,上述学者并没有对“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相关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除了斯波尔德、斯登伯格和拉夫劳伯等少数几位学者,其他学者谈及这一问题时,通常是说“一个关于地中海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Mediterranean),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共同体是一个特定的实体存在,只不过是借用“共同体”这样一个术语来表达地中海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就存在的密切联系和交往。

200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家伊莱德·马尔金提出了“网络理论”这样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可以算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研究的第三种范式。网络概念是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的一个突出内容,这一概念取代了“中心—边缘”分层结构的构想,提出了一种新的地域和人类空间的视角。基于罗斯托夫采夫和亨利·皮朗将地中海视为一个“商路交织而形成的网络”的观点,马尔金借鉴网络概念进一步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公元前11世纪左右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在希腊大陆海岸、爱琴海、小亚细亚、普罗庞提斯以及黑海、意大利、西西里、法兰西、西班牙和北非所建立的希腊殖民地和它们的领土范围,就类似一种网络。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不管是一个城邦还是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微区”,这些微区的各个要素(如城镇、圣所、邻居等)之间又有各种关系。这些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城邦,也形成一种网络。^③他认为,古代地中海在古风时代(约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第一次形成了“地中海文明”,这个文明主要由各个独立的政治和商业共同体组成,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散布。在这个由各个沿岸城市 and 海岛组成的海洋文明的整体网络中,希腊人、埃及人、埃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是主要的活跃者,这些族群所形成的各种文明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文化边界,整个地中海区域形成了一个文明交互的共同体。^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尔金没有明确使用“地中海共同体”这个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文明交互的共同体”显然受到了相关学术潮流的影响。

当然,上述三种研究范式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界线,本文所说的范式转变,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基本按研究成果出现的时间顺序,归纳出来三种有比较明确特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其中,比较研究当然是基础,也是基石。只有对基本的、具体的史料进行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才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宏观理论研究。但是,比较研究侧重于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目的在于提供证据,而材料本身并不能提供文明交流的可靠证据,并且比较研究又缺乏在较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的解释框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流中的变化和差异性。因此,比较研究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所提供的证据也未必准确。马尔金的“网络理论”实际上是“地中海共同体”观念的某种延伸,并在延伸的基础上有所反思,但是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超越“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探讨的范畴。笔者认为,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地中海共同体”或许是可资借鉴的最佳理论范式。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地中海共同体”的一般特点和基本特征,并且尝试评估作为一种古代文明交流互动研究范式的可行性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些问题。

① Ian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1.

② Sarah Morris, *Daidalos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她在《荷马与“近东”》一文中也概括了希腊和东方的密切联系,参见 Sarah Morris, “Homer and the Near East”, in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 eds.,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E. J. Brill, 1997, pp. 599–623.

③ 伊莱德·马尔金《网络与希腊认同的兴起》李永斌译,《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2期。

④ Irad Malkin, *A Small Greek World: Network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1.

二、不同历史学家笔下的“地中海共同体”

在专门的地中海史研究著作中,关注古风时代地中海世界的作品并不多,但是在有限的笔触中,历史学家还是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笔下的“地中海共同体”,尽管有的学者并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

英国伦敦大学的佩里格林·霍登和牛津大学的尼古拉斯·珀塞尔于2000年出版了地中海史的扛鼎之作《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他们力图从微观生态的视角、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角度来重构地中海的形象。尽管霍登和珀塞尔强调地中海地区存在多种多样的微观生态,但也强调地中海的连通性。地中海复杂的海岸线和数不尽的岛屿、环环相扣的低地、能够频频通行的滩涂与河流,这些地理条件使得交流的体制成为可能。他们强调不同微观生态之间的人们因便利的海上联系而发生的互动,这样就抓住了历史“区域”因联系而形成的这一根本属性。^①具体到古风时代的地中海,霍登和珀塞尔以科莫斯港和扎戈拉为例考察了地中海范围内广泛的文明互动现象。科莫斯位于克里特岛,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克里特岛同腓尼基世界之间重要联系的证据;对当地古代涂鸦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包括优卑亚和中希腊)的希腊人也在公元前8世纪到达了此地。扎戈拉位于优卑亚岛附近的安德罗斯岛上,扎戈拉出土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个定居点在公元前8世纪参与了地中海地区的物资再分配体系。^②霍登和珀塞尔也关注希腊人的殖民活动,他们认为希腊的殖民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是地中海航海史上互动潜力最为充分的一次大爆发。通过纷繁复杂、无孔不入的海上互动与随之而来的建立殖民城邦习俗的发展,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自己已将由希腊海外定居点构成的世界视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统一体。^③不过,书中关于希腊殖民时代地中海的讨论并不多,仅仅是将这一时期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点顺便提及。因此,关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文明交流互动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剑桥大学的大卫·阿布拉菲亚在他的名作《伟大的海》中将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0年的地中海称之为他的“五个地中海”中的“第二个地中海”。他认为,关于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的地中海,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网络,东方文化被传至西方,最远到了埃特鲁里亚和南西班牙。这些新贸易网的建立,并没有借助大规模的帝国扩张实现,而是由商人团体建立:希腊人有意或无意地在追寻其迈锡尼先人的足迹,将方向转向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埃特鲁里亚海盗和贸易者出现在刚刚兴起的城市里;更为超前的是,黎巴嫩的迦南商人,也就是希腊人熟知的腓尼基人也出现了,这一族群因为热爱贸易和追逐利润而著称。阿布拉菲亚认为,欲探寻腓尼基早期贸易帝国的踪迹,最好的途径就是在公元前800年前后进行一次环地中海航行。航行的路线是从推罗、西顿等城市出发,沿着向北的路线,经过塞浦路斯岛、罗德岛及克里特岛,而后穿过广阔无垠的伊奥尼亚海,最终到达南意大利、南撒丁岛、伊维萨岛及南西班牙。在返回推罗的旅程中,腓尼基人会沿着漫长的北非海岸前行。^④阿布拉菲亚对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描述,主要是基于腓尼基等族群的商贸活动而勾勒出一幅整体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主要的活跃者还包括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尽管阿布拉菲亚没有提供更多文明交流

① 夏继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地中海史研究》,“作为一个世界史研究单元的地中海世界”学术研讨会资料集,首都师范大学2019年,第12页。

② 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吕厚量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0页。

③ 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191页。

④ 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徐家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3—86、93—94页。

的细节证据,但是他道出了古风时代“地中海共同体”的核心,那就是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这也为我们在“地中海共同体”视野下研究文明交流及互鉴提供了一个宏观层面的指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中海研究中心主任威廉·哈里斯主编的《重新思考地中海》一书中,也有几位学者探讨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和流通性。在《地中海与古代历史》一文中,哈里斯并不认同霍登和珀塞尔的理论。他指出,很多学者(包括霍登和珀塞尔)通常仅仅将“地中海”作为“希腊和罗马外加其他一些我们可能偶尔注意到的古代文明”的同义词,^①因此,地中海的统一性就是必须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了。同样,地中海与其他地区相较而言的独特性,以及这种所谓的独特性的意义也是必须讨论的问题。他认为,地中海的统一性问题,实际上是与其独特性问题紧密联系的。哈里斯具体探讨了“古代地中海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统一体”的问题。他指出,既有一种弱意义上的统一性,也有一种强意义上的统一性。所谓弱意义上的统一性,指的是在相似的气候中,依靠相似的动物和植物,人们的生存方式必然存在相似性和连续性。至少从自然条件来说,这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有着较为明显的自然属性的边界,这个区域的温度和湿度相对适中,有足够的水来支撑农业和城镇,并且发展水平较为相似。所谓强意义的统一性,指的是当地经济体与更广阔的地中海紧密相连。但是哈里斯对强意义的统一性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如果在任何特定时间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人是自给自足的渔民、牧民或农民,那么地中海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一个整体;如果说地中海区域各经济体相互之间构成了联系,那么构成联系的要素是什么?不仅是沿海贸易、长途贸易、海盗和移民,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人类和非人类的活动,包括植物的传播和疾病的传播。^②阿兰·布莱松在《生态学及其他:地中海范式》一文中指出,《堕落之海》所讨论的关键主题——高水平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是由地中海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布莱松认为,海运在成本和速度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尤其是在重型货物的运输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认识到地中海可能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连通空间。这一特点适用于地中海的每一个海岸,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的半岛,因为它们的海岸线特别长。应当补充的是,地中海中的岛屿也为潜在的连通性提供了额外的补充。在爱琴海空间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系列较小的岛屿,并组成了群岛,这些群岛内部的交流为整个地中海区域内的连通空间提供了样本。布莱松指出,地中海地区的流通性大大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公元前一千纪,地中海地区财富的集中程度以及思想文化所达到的水平和形式,对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区的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③

尽管《堕落之海》《伟大的海》和《重新思考地中海》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直接论及“地中海共同体”,对古风时代的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交流活动也着墨不多,但讨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如何处理地中海世界的碎片化与统一性,实际上也就是在讨论“地中海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单元的合法性问题。当然,对这个核心问题的回答是不相一致的,这也反映了地中海史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两种不同传统。第一种传统是研究“在地中海的历史”,始自罗斯托夫采夫。他强调人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强调地中海范围内的宏观互动,将地中海视为商路交织而形成的网络,而这一网络中

① W. V. Harris, “The Mediterranean and Ancient History”, in W. V. Harris, ed., *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

② W. V. Harris, “The Mediterranean and Ancient History”, pp. 25–26.

③ Alain Bresson, “Ecology and Beyond: The Mediterranean Paradigm”, in W. V. Harris, ed., *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 pp. 94–116; 李永斌《评威廉·哈里斯〈重新思考地中海〉》,《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2期。

的商贸活动非常显著地受到了希腊殖民活动的影响。^① 罗斯托夫采夫关于地中海是一个统一体的观点得到了亨利·皮朗和阿布拉菲亚的继承。后来的“地中海共同体”概念和马尔金的网络理论,实际上是这一传统的进一步延续。这种传统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文明交流互动的主体是人以及人的活动。正如阿布拉菲亚所言,人们必须对沿着汇入地中海的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进行考察,也就是考察这样一类人,他们涉足地中海,最好还是跨海航行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跨文化贸易、宗教及思想的传播,同等重要的是,有些人还参与了海上航海控制权的争夺。^② 第二种传统来自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虽然也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但是更强调地中海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力图在整合差异性的基础上来探寻地中海的统一性。^③ 这种传统在《堕落之海》中得到了继承,《堕落之海》的研究方法的典型特征是从地中海的具体场景出发,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微观生态的形成,进而关注因“连通性”而形成的地中海历史的整体性。^④ 《重新思考地中海》中对于地中海研究的“重新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对布罗代尔模式的“重新思考”,以及对这些“重新思考”的进一步再思考。但是,这些重新思考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布罗代尔开创的“属于地中海的历史”的研究范式。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公元前8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来看,完全可以用“地中海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来研究这一时期文明交流互动的情况。尽管很多学者没有直接论及这个概念,但他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与“地中海共同体”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地中海的整体性问题。在论及“地中海共同体”的学者中,有人认为地中海是一个“政治和贸易共同体”,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归纳出“地中海共同体”的几个一般特点:1. 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2. 因联系而形成的“区域”;3. 统一性与独特性紧密联系;4. 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高水平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这几个一般特点中,最突出也最基本的特征是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

三、从阿尔米纳和瑙克拉提斯透视“地中海共同体” 中的文明交流与互动

就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而言,商贸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希腊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和黑海沿岸建立了数百个移民定居点,也就是后世学者所习称的“殖民地”。在移民的过程中,以及移民定居点建立以后,商贸活动一直是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文明交流的主要形式和载体。这些商贸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明交流活动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证明。阿尔米纳和瑙克拉提斯是考古学证据较多的两个交流枢纽,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来透视“地中海共同体”中的文明交流与互动。

在北叙利亚奥隆特斯河(Orontes)的入海口地区,有一处名为阿尔米纳(Al Mina,阿拉伯语意为

① Michael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92.

② 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序,第4页。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20页。

④ 夏继果《“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两种不同的治史路径》,《光明日报》2019年2月25日。

“港口”)的考古遗址。^①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古风时代的希腊陶器,希腊陶器的数量甚至占到了该遗址陶器总数量的一半。^② 此前关于阿尔米纳的学术研究和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希腊与东方的关系方面,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来看,阿尔米纳所体现的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尤其是贸易方面的交流,其实也是地中海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在阿尔米纳第九层(时间为公元前750年左右)大量出现的双耳深口酒杯,也出现在地中海西部最早的希腊殖民地皮特库萨(Pithekoussai)等地。^③ 在阿尔米纳第九层和第八层(时间大约为公元前750年—前700年)发现的悬空半圆纹饰双耳阔口陶器来源于优卑亚岛,这种优卑亚陶器在公元前8世纪也广泛分布于色萨利、阿提卡、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等地区。在之后的考古层中还发现了来自罗德岛、科林斯、莱斯博斯、开俄斯和雅典等沿海城邦的陶器。

在地中海的商贸活动中,陶器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能作为船只的压舱物,因此,不论是低廉的陶罐还是精美的陶瓶,都是受欢迎的产品。此外,古希腊陶器所用的黏土比叙利亚—利凡特地区的更能制作出光滑的陶器;在几何时代,古希腊陶器可以远销西地中海、北非,当然也深受近东地区人们的喜爱。^④

陶器并不是陶器贸易中唯一的商品,有时陶器里所盛的货物才是真正的贸易商品,比如橄榄油、葡萄酒和香水等。考古学家在阿尔米纳出土的一个陶瓶里发现放满了银币;在阿尔米纳第三考古层中发掘出了大量的叙利亚单柄细颈罐(Syrian *lecythi*),这种小口高细颈单柄的陶器应该是用来盛放液体的。考古学家的研究证明,这些陶器里盛满了油。它们在同一时间以成百的数量出现,说明是用于贸易而不是日常使用;之所以被留存在仓库,可能是因为突发火灾还没来得及运走。其中很多陶罐有被严重焚烧的痕迹,且有些陶罐已经被嵌入烧得又红又硬的土层里。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可能是陶罐里的油引发火灾,进而导致陶罐被烧。^⑤

在阿尔米纳发现的其他物品(尤其是装饰品),也反映了阿尔米纳处在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络体系中。比如,阿尔米纳出土的石板首饰铸模具上出现的短桑葚式吊圆形耳环是叙利亚式的,这种耳环在公元前16世纪流行于后期克里特、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叙利亚;在黑暗时代,仍然在塞浦路斯和腓尼基时兴;在几何风格时代和早期古风时代,在地中海和近东广泛传播。^⑥ 在公元前7世纪的叙利亚、塞浦路斯、西里西亚和意大利的墓葬中都发现此种耳环的银制品,金制的此种耳环则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的腓尼基墓葬中。这种短桑葚式吊坠也是后期赫梯女性雕塑饰品中流行的样式。此类装饰也出现在亚述、巴比伦和基泽。^⑦

阿尔米纳作为叙利亚沿岸通往近东内陆的港口,成为连接地中海和东方城市的豁口。来自地中

① 关于阿尔米纳的考古发掘,参见 Leonard Woolley, “The Excavations at Al Mina, Sueidia [I & II]”,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58, 1938, pp. 1–30, 133–170; “Excavations near Antioch in 1936”,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Vol. 17, 1937, pp. 1–15.

② R. A. Kearsley, “The Greek Geometric Wares from Al Mina Levels 10–8 and Associated Pottery”,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Vol. 8, 1995, pp. 71–72.

③ Jean-Paul Descœudres, “Al Mina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Vol. 15, 2002, p. 51.

④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4th edition, Thames & Hudson, 1999, pp. 153–154.

⑤ Leonard Woolley, “Excavation near Antioch in 1936”, p. 7; 李永斌《阿尔米纳:希腊与近东文明交汇的集散中心》,《光明日报》2020年5月3日。

⑥ M. Y. Treister, “North Syrian Metalworkers in Archaic Greek Settlements?”,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4, 1995, p. 160.

⑦ 关于阿尔米纳发现的陶器及其他物品,参见李永斌《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图景》,《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海的商旅沿奥隆特斯河谷向东,经过阿尔米纳,直达位于奥隆特斯河自南向西转折处的阿米克平原。^①考古学家在阿米克平原发现了上百个古代城市的考古堆,说明这里在古代人口稠密并且非常富饶,为海外商人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暂时停留地。但是,由于阿曼山的阻隔,致使阿米克平原上的阿尔米纳及其他的沿海港口,与东边内陆城市的交流并没有那么方便,在地理上反而与地中海和爱琴海海岛联系更为紧密。因此,阿尔米纳不仅是希腊与东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而且也是希腊人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贸易交流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连接点。

另一个能够明显体现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地中海共同体商贸和文明交流的古代定居点是瑙克拉提斯(Naukratis)。瑙克拉提斯位于东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卡诺比斯河口(Canopic branch),可以由河运到达内陆,也可以通向地中海,处在埃及对内对外贸易路线的枢纽地带,是古风 and 古典时代希腊人在埃及的重要贸易港口。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之前,它不仅是希腊与埃及联系的重要连接点,也是埃及在地中海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枢纽。瑙克拉提斯作为地中海贸易路线中重要的一部分,其中的活跃者主要是埃及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腓尼基人的红酒和黎巴嫩的雪松酒在公元前20世纪开始,就已经被运往埃及。^②尤其是腓尼基红酒,最受埃及贵族的欢迎。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用来装红酒的腓尼基酒器在埃及的诸多地方都有发现。不仅如此,埃及的物品也出现在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在瑙克拉提斯的工匠会生产陶器,尤其是圣甲虫和小型雕像,并将它们运往东地中海的各处。^③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就有专业的商人前往并且长久居住在瑙克拉提斯,^④这些商人可能来自希腊和腓尼基,以及与腓尼基人一道塞浦路斯人。瑙克拉提斯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地方,除了希腊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塞浦路斯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民族也出现在瑙克拉提斯。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述,这些人可能是商人、工匠、海员、神职人员、妓女、退役雇佣兵和旅行者。值得注意的是,瑙克拉提斯和阿尔米纳之间可能也有贸易往来。在瑙克拉提斯发现了生产小型雕像和圣甲虫的工场,这些产品一部分供当地使用,一部分出口海外。^⑤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希腊人将葡萄酒和橄榄油放在陶器中运往埃及,埃及人则将这些陶器盛上清水,商人和旅行者带着这些陶器前往没有水的叙利亚。^⑥在阿尔米纳发现的埃及圣甲虫和护身符,可能是由腓尼基人从瑙克拉提斯带去的,但也不排除是由埃及来的商人直接带往阿尔米纳,然后销往东方内陆的。但不论这些产品是腓尼基人从埃及带来销往希腊,或是销往东方内陆,都能说明当时的贸易网络十分发达。

不论是以阿尔米纳为连接点的希腊与近东的贸易联系,还是以瑙克拉提斯港为接口的希腊与埃及的贸易联系,都是地中海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埃及在这一贸易网络中的枢纽位于瑙克拉提斯,^⑦叙利亚及内陆东方在这一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则位于阿尔米纳。阿尔米纳和瑙克拉提斯所属的贸易

① 在阿米克平原东部的考古堆中,发现两片属于克里特的陶器碎片。但是,为阿米克服务的港口阿尔米纳,最早的考古材料来自公元前8世纪。伍利认为,阿尔米纳从青铜时代开始就有希腊人定居了,之所以没有相应的考古发现,是由于奥隆特斯河道变化,将公元前8世纪之前青铜时代的建筑和遗迹冲刷到大海里了。参见 Leonard Woolley, "The Excavations at Al Mina, Suedia [I & II]", p. 28.

② Astrid Möller, *Naukratis: Trade in Archaic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

③ Alexandra Villing, *Naukratis, Egypt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 Port and Trading City*, Project of The British Museum, p. 3. <http://www.britishmuseum.org/naukratis> [2019-08-30]

④ Alexandra Villing, *Naukratis, Egypt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 Port and Trading City*, p. 5.

⑤ Astrid Möller, *Naukratis: Trade in Archaic Greece*, p. 153.

⑥ Herodotus,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William Heinemann, 1921, p. 9.

⑦ Alexandra Villing, *Naukratis, Egypt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 Port and Trading City*, p. 4.

网络,以及在这些贸易网络基础上形成的文明交流共同体,都体现了“地中海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

考古学界目前关于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商贸证据主要集中在东地中海沿岸。不过,也有少数考古发现证明了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与更西部的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联系。在萨摩斯岛(Samos)南端的赫拉神庙,出土了大量东方和埃及的象牙和青铜制品,还有大量的塞浦路斯陶瓶,其分布时间从公元前8世纪末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初。^①考古学家在赫拉神庙中发现的青铜制品有不少明显是从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等地传来的,其时间基本在公元前650年左右。^②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件带雕刻图案的象牙梳子,考古学家认为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下游的腓尼基人作坊的产品。^③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饰以四位裸体女神浮雕的马头雕像和一对属于一副马具中的眼罩。这两件物品上的阿拉米亚铭文表明,这是大马士革的哈扎尔(Hazael)国王授予某人的奖励。^④这就表明,这一时期,东起大马士革,西到安达卢西亚,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处在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络之中。

结 语

关于“地中海共同体”,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公元前8世纪左右,在腓尼基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商贸活动的基础上,整个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个超越各族群组织之上的文明交流共同体,这个“地中海共同体”的大致范围包括整个希腊大陆和爱琴海诸岛屿、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城市、小亚细亚、利凡特的广大地区、以埃及为代表的北非地区,以及腓尼基人活跃的地中海沿线各个城市,当然也包括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地区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殖民城市。^⑤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地中海共同体”首先是一个贸易共同体,在复杂的贸易网络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文明交流的共同体。

我们在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文明交流之时,可以将“地中海共同体”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但是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不仅仅只适用公元前8世纪这一时期,也适用于后来更长时段、更大空间范围内地中海的文明交流与互动。虽然最初提出“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学者们所指称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但是地中海世界的商贸和文明交流却一直延续,并且随着航海技术的改进和周边一些国家实力的增强而进一步加强。因此,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应该视为地中海共同体的形成阶段。随着地中海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中海共同体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也有所变化,甚至可以说一直在变化。直接论及“地中海共同体”的学者们关注的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地中海共同体的文明交流,主要还集中在东部地中海。到罗马帝国时期,文明交流互动的范围就真正扩大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甚至超出了地中海的范围,

① Edward Lipiński, *Itineraria Phoenicia*, Uitgeverij Peeters en Departement Oosterse Studies, 2004, p. 155. 关于腓尼基与地中海地区象牙贸易关系的整体考察,参见 Richard D. Barnett, “Phoenicia and the Ivory Trade”, *Archaeology*, Vol. 9, No. 2, 1956, pp. 87-97.

② Edward Lipiński, *Itineraria Phoenicia*, p. 156.

③ 参见李永斌《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图景》,《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④ 对该铭文的释读和解释,参见 Israel Eph'al and Joseph Naveh, “Hazael's Booty Inscriptions”,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Vol. 39, No. 3/4, 1989, pp. 192-200.

⑤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论及“地中海共同体”的基本情况,参见李永斌《地中海共同体视野中的荷马史诗与古代东方文学传统——以“宙斯受骗”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9年第14期。

包括西亚地区和不列颠地区都受到地中海地区商贸活动的影响。罗马时期的地中海共同体,不仅是文明交流的共同体,更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的共同体。罗马帝国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地中海世界被成功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过程,而这种帝国组织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又为地中海世界经济、社会、商贸、文化等多方面的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安全保障。

第二,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地中海沿岸大多数地区仍以本地农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商贸活动和文明交流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古代希腊的工商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但本地农业仍然是主要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希腊城邦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和商人。^①在古代埃及社会,农业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远远高于商业活动。由于尼罗河谷是适于耕作的宝地,只要尼罗河保持正常的水位,整个国家的供给就不成问题。埃及人虽然很早就与周边的民族有交往,但这种交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原料和一些贵重物品,如金属、宝石、油料、酒料等。^②早期阶段的地中海共同体主要是一种文明交流意义上的共同体,并没有改变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也没有改变牵涉其中的各个文明所独具的基本特征。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希腊殖民运动,已经开始有了政治组织方面向着共同体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缓慢发展,最终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第三,就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来说,各文明之间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仍然远远大于共性,局部的交流远远多于整体性的交流。“共同体”是一个学术名词,表达的是某些方面的联系和共性,这些联系和共性与网络理论所探讨的联系和共性有着同样的对象。比如,从希腊到西西里的阿波罗崇拜网络、从赫拉克勒斯到马尔卡特(Melqart)的英雄崇拜网络、^③整个地中海范围内的圣所网络、^④古代地中海在税收管理上的相互依赖,^⑤这些都是具体的文明交流事项,体现了某些文化和观念方面的流动和共性。但是,这一时期的地中海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整体。正如前文所述,地中海范围内存在着诸多贸易网络,这些贸易网络共同构成了以商贸和文明交流为基本特征的地中海共同体。在这诸多贸易网络中,主要参与者各有侧重,有的以希腊为中心,有的以埃及为中心,有的是以希腊—埃及为主要交流路线,有的是以希腊—小亚细亚为主要交流路线。从整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地中海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仍然处在早期阶段,更多的还是局部的、相对短途的交流,大范围的长途贸易和文明交流主要是由这些局部的交流衔接和交织而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一个整体。因此,以“地中海共同体”为研究范式的古代文明交流研究,还是要强化对各个文明区域的具体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文明交流做出更具体、更细致的探讨。本文即是在这方面的初步尝试,期待学者们在相关问题上有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邮编:100089)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② 金寿福《永恒的辉煌:古代埃及文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③ Irad Malkin, *A Small Greek World: Network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pp. 97—142.

④ Ann C. Gunter, *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52.

⑤ Nicholas Purcell,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The View from the Customs House”, in W. V. Harris, ed., *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 pp. 200—234.

research perspectives. Meanwhile, they have promote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wher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e from and where to go, and to further facilitate breakthroughs and nurture innov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Mediterranean Koine”: A New Interactive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 Li Yongb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ancient civilization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archaic period has developed three paradigms, includ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 regional approach that regards the Mediterranean as a *koine*, and a historical approach based on network theory. Among them, the “Mediterranean Koine” approach might be theoretically the be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various historians have adopted this paradigm, their shared views on the main features of such a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includ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integrated “region” formed through the connection, the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 and the high level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determined by the uniqu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trade activities are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 “Mediterranean Koine” from the eighth to sixth century BC. To adopt the “Mediterranean Koine” as a paradigm in research,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civilizations such as their various scopes of time and space and social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ir unique natures and levels of differences.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Employment System in Medieval England in the West // Xu Hao

In the past, scholars regarded the production of employment as a major indicator in the study of the germination of capitalism. Yet the germination of capitalism is merely one of the many perspectives through which to study the employment system. J. E. T. Rogers published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in 1866. Since then, the study of employ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has been undertaking over the course of one and half a century, giving rise to three paradigms, including the one focused o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laborer’s wag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by Rogers, the one that argued for the rise of capitalist employmen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Karl Marx, and the one that was focused on wage labor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tudy of medieval wage labor also includes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including a manor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a soci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and a history of the be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the above-mentioned approaches will help us to identify their value as well as limitations. It is also useful to examine their legacy dialectically and to reflect upon the nature of the employment system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pitalism or modern employment system in order to construct our own research paradigm on this issue.

“Experience” and “Emotion” in the Recent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ng Guanqun, Zha Shaoche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istorians have increasing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is new tendency has been long nurtured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ield. The orthodoxy theory once regarded class confrontation 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revolution, while the revisionist theory replaced it with discursive conflict. Both theories, however, overlook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Revolution. Influenced by emotional history and other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some researchers of the Revolution now take account of the individual agency, in attempt to reevaluate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lives, emotions, and experiences. Historians conclude that even if people living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re in exercise of reasoning, they were also making decisions while being affected by emotions, particularly at some radical situation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relation with emotions and traumas, c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political decisions and pushed the Revolution forward. This trend of scholarship could complement the